

朝鲜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晚年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有过5次交往。在这些交往过程中,他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从质疑到逐渐接受,并开始在朝鲜实施经济改革的积极尝试。

1978年

邓小平到朝鲜学习经验

20世纪70年代,朝鲜依靠苏联、中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经济发展迅速。70年代末,朝鲜建立了比较发达的石化产业,实现了相当程度的农业机械化,粮食自给自足,推行免费教育、医疗,处于“吃米饭,喝肉汤”的黄金年代。

此时,中国刚结束“文革”,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1978年9月9日,邓小平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朝鲜国庆庆典,一方面为了拉住朝鲜,不让其全面倒向苏联;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实地参观朝鲜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学习一些先进的经验,并寻求其对中国即将实施的改革开放的理解和支持。

1982年

打消金日成对中国的疑虑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走得越来越近,与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越南却关系紧张、对立严重。金日成心中充满疑虑:“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吗?会不会倒向美国?还是可以信赖的盟友吗?”



1982年邓小平会见金日成

进技术;另一方面会坚持马克思主义,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通过深入会谈,双方找到了利益共同点,基本消除了金日成关于“中国会全面倒向美国”的疑虑。

1982年

金日成决心尝试经济改革

朝鲜在20世纪60至70年代经济发展要好于韩国,具有较大的优势。但从70年代末开始,韩

国经济发展增速,到了1980年人均GDP为朝鲜的两倍。面对韩国的挑战,金日成认识到必须进行经济改革,并认为改革开放初见成效的中国是最好的榜样。

1982年9月,金日成访问中国。邓小平陪同金日成到四川进行了访问参观。邓小平谈了“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观点,金日成十分赞成。通过这次访问,金日成对中

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具体做法有了深刻的认识,同时也开始反思朝鲜全盘苏化的工农业经济体制,并在不久后进行了经济改革的初步尝试。1984年9月,朝鲜颁布了《合资企业法》,以吸引外资和先进技术。1985年3月,又颁布《合资企业税法》和《外国人所得税法》,邀请外国企业来朝鲜投资合作。朝鲜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1987年

邓小平拒绝抵制汉城奥运会

新中国建立后,与韩国一直处于冷战状态。1983年5月,发生卓长仁劫持中国民航客机事件,韩国向中国释放了善意,很快把劫持降落在其境内的中国客机和旅客送还中国。中国政府为了投桃报李,在1983年8月申办1990年第11届亚运会时保证,将为包括韩国运动员在内的所有亚运理事会成员国派发签证。此后两国经贸关系日益密切。

邓小平认为,与韩国改善关系具有战略意义。一是有利于改革开放。二是孤立打击台湾。韩国是亚洲唯一一个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我们跟韩国关系改善并建交,对台湾是一个孤立和打击。中韩要改善关系,中方需要让朝鲜接受这个现实。1987年5月22日,金日成访问中国。当时,韩国准备举办1988年奥运会(即汉城奥运会),朝鲜担心韩国借机扩大国际影响,提升国际地位,希望中国带头以促使一些国家抵制这一届奥运会。邓小平表示,中国

没有理由不参加汉城奥运会。谈到中韩关系的改善,邓小平特别谈到,处理国际问题需要从更加广泛的角度观察问题、回答问题、解决问题,每个国家的党都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处理问题,强求一致是不可能的。

1991年5月,邓小平借李鹏访朝之机向金日成提出了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的问题。金日成认识到这是大势所趋。1991年9月,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为1992年8月中韩正式建交铺平了道路。

1991年

朝鲜照搬中国深圳特区做法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朝鲜失去外来援助,也失去了对外贸易的主要市场,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冲击。1991年10月,为了学习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先进经验,同时在政治上向中国靠拢,金日成最后一次正式访华。邓小平年事已高,已不再会见外国客人,但破例会见了金日成。邓小平深刻分析了复杂的国际形势,并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要有两手,一手搞改革开放,一手搞“四个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手核心的是发展生产。

这次访问,金日成看到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就,坚定了学习中国的决心,回国后便向全党提出“贸易第一主义、轻工业第一主义、农业第一主义”的纲领,于1991年12月宣布建立罗津先锋经济自由贸易区,简称罗先特区,基本照搬了中国深圳特区设立时的政策和做法。1993年10月,朝鲜通过了《外国人投资法》等10多个法规,允许外国投资者在朝鲜建立合作企业、合营企业。就在朝鲜的改革起步之际,金日成于1994年7月8日与世长辞。

此后几年,朝鲜安全局面空前恶化,继任的金正日选择推行“先军政治”,并努力开发和研究核武器,朝鲜刚刚开始的经济改革半途而废。

(摘自《文史精华》)

蒋介石图谋取道越南“反攻大陆”

越南战争时期,越南分为北越、南越。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与南越当局“建交”后,曾试图取道南越“反攻大陆”,最终失败。

蒋介石欲组“四国同盟”失败

从一开始,蒋介石的“反攻大陆”种种企图就遭到美国的坚决反对。冷战初期,美国将台湾纳入西太平洋战略防御线的一环,但历任政府都不愿被蒋介石拉上“反攻大陆”的战车。美国仅容忍其在一定限度内对大陆进行小规模的侦察窥探,而不允许它向大陆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

1964年中法建交之后,台湾当局向美国提出巩固其在东南亚的地位。2月下旬,国民党当局先后向华盛顿提出:第一,由美国牵头组建美国、韩国、南越和台湾的“四国同盟”,各个“成员国”的军事力量可以由盟国支配;其次,如果美国不赞成参与“四国同盟”,可由韩国、南越和台湾三方缔结“盟约”,美国则允诺给予海空力量的支持;第三,请求美国支持台湾和东南亚国家发展“双边关系”,即支持台湾和南越、韩国分别签订“军事互助条约”;鼓励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和台湾建立“外交”或贸易关系;美国出资赞助台湾扩大对南越的技术援助规模等。美国明白,蒋介石此举名为加强其远东“国际地位”和支持美国在越南的行动,实际是想为“反攻大陆”做准备,故予以断然拒绝。

鼓噪“开辟第二条反攻道路”

1964年4月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抵台“访问”。这是约翰逊上台后美国高级官员对台湾的首次“访问”,蒋介石试图通过说服腊斯克来改变美国对台湾“反攻大陆”的态度。

蒋介石在与腊斯克会谈时,要求美国支持其向大陆发动大规模的“反攻运动”。腊斯克生怕美国被国民党拖入与中共的战争,马上表示异议说,除非美国军事力量直接大规模介入,甚至使用核武器,不然国民党军队不可能在大陆站住脚跟;他驳斥蒋介石的第二个理由是,台湾对大陆的行动将使中苏握手言和,他说如果台湾进攻大陆,“赫鲁晓夫很可能重新倒向毛泽东,整个北半球将因此陷入战争的火海”。双方话不投机,不欢而散。

没有获得美国支持,台湾当局暗地里自主加强和东南亚“反共势力”联系的努力。1964年4月19日,老蒋右派将领库普拉斯斯·阿贝发动军事政变,宣布自己为新政府的“革命委员会”主席,并声称其政权得到台湾、越南和泰国等的支持。美国获知消息后,立即警告国民党当局,要求其马上停止在老蒋的行动。但国民

党当局矢口否认曾经支持过阿贝集团。然而,台湾的报纸却一直一直在鼓噪:“国军入越作战将可能开辟第二条反攻道路。”

美国警告国民党“中止行动”

1964年下半年,随着美国在越南军事行动的不断升级,华盛顿对台湾当局在东南亚的动态保持高度警惕,以防止国民党对局面的搅扰而起中共的干涉。《纽约时报》5月13日报道,美国陆军突击队正在台湾的深山老林中秘密训练国民党特种部队,并猜测这些经过挑选的突击队员可能将被偷偷送到中国大陆。美国国务院立即发表声明:美国在台军事人员帮助国民党训练军队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台湾,而不是为了用于“越南共和国”。

1964年8月之后,越战升级,在东南亚的国民党残军蠢蠢欲动。9月4日,美国驻缅甸大使馆报告国务院,缅甸当局对驻扎在缅甸边境的国民党军队的活动表示担忧。腊斯克立即致电“大使”赖特,要他转告台湾当局,“美国反对国民党残军进入这一地区,以免引起美越之间的误会”,并要他警告国民党“立即中止在东南亚采取过激的轻率行动,以免局势更加复杂化”。10月12日,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马歇尔·格林也通过国民党“驻美公使”沈铸警告台湾,不要和老蒋右派政要交往太密切。

蒋介石一直援助南越

蒋介石知道美国不会支持他取道越南“反攻大陆”,但他支援南越的热忱并未稍减。1965年后,台湾以各种方式参与美国在越南的行动,目的是通过扩大对南越的援助以“套牢”美蒋关系,阻止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仅至1965年5月下旬,台湾共向南越派出了包括86个人组成的农业援助小组、18个人组成的“心战”顾问团、10个人组成的医疗队、9个人的电站维修队。此外,还在岛内帮助训练200多名南越军事人员。

1964年10月,台湾派遣“中华民国驻越南军事顾问团”赴越。1967年2月台湾军事顾问团改为“中华民国驻越南援团”。台湾顾问团和军援团驻越期间,协助南越成立政战总局,建立各级政战组织,开办政战教官班等。1973年,南北越签订《巴黎和平协定》后,所有援助南越的外国军队和军事人员必须全部撤出。但国民党基于共同反共的立场,决定军援团以“驻越建设顾问团”的名义继续留越援助,直到1975年4月南越灭亡。这时,蒋介石去世,其取道越南“反攻大陆”的图谋彻底落空。

(摘编自《百年潮》《国际政治研究》)

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互相关怀

上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和周恩来这对多年的老战友、好搭档,都进入了生命的最后几年。尽管如此,他们依然而为对方国家大讨忙碌,并一直互相关怀着对方。

一副再普通不过的眼镜

1973年春,毛泽东的视力急速下降。多年来他每天都要花大量时间读书看报,批阅文件、撰写文章,视力的下降让他非常不便,也十分难受。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经常接见外宾,摄影灯在他的眼前接连闪动,对他的视力更是不利。

周恩来对此十分关注,他将杜修贤等摄影人员召集在一起,指示拍摄毛泽东外事活动的照片时必须控制在三秒钟以内,时间一到立即关灯。

1974年8月,毛泽东被确诊为双眼患有老年性白内障。由于手术时机尚未成熟,医生只能让他一直服药、滴眼药水,并继续休养一段时间。

周恩来得知后非常着急,他组织眼科专家会诊,还将自己使用多年的一副眼镜送给了毛泽东。他在给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信中写道:“这副眼镜是我戴了多年、较为合适的一副。送给主席试戴,如果不合适,告诉我,给主席重配。”

一年后,实施手术的时机成熟了。当时,周恩来也正饱受疾病的折磨,在三〇五医院住院,但他还是专门向主刀大夫详细地询问了毛泽东手术的相关情况。

1975年7月23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接受了白内障手术。其时,周恩来查出癌症已有三年,自己也动了多次手术。但他却强忍着病痛,坚持来到手术现场,一直等到手术顺利结束,才放心离去。

“他的身体,我是替他担心的”

正如周恩来关心毛泽东,毛泽东同样也时时牵挂着他的老战友好搭档。工作人员为毛泽东做了一个合适的沙发,他马上嘱咐工作人员:“总理现在生病,给总理送个去。”在与李先念谈到周恩来的健康问题,他说:“他的身体,我是替他担心的。”

1972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毛泽东一字一句地将病情报告读完,表情严肃,心情沉重。他亲自指示由叶剑英、邓颖超、汪东兴等领导医疗组的工作,并要求“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



晚年毛泽东和周恩来

同年11月,周恩来病情日益严重,医务人员再次向中央报告,毛泽东阅后批道:“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1973年,周恩来突然出现了尿血的症状,泌尿科专家吴阶平成功地用电烧手术器械烧掉了病灶,毛泽东得知后马上让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医务人员说:“医生们做得好,感谢他们!”

之后,毛泽东也一直惦记着周恩来的病情。每次审阅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他总是格外认真仔细,当患有眼疾无法自己阅读时,就让工作人员念给他听。听过之后,毛泽东甚至还能记住周恩来每天失血的数字以及施行手术的次数。

“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

另一方面,周恩来却因自己的病情让毛泽东牵挂担心而心存不安。1975年,周恩来体内出现新的恶性肿瘤。他亲自写了一封信向毛泽东详细说明了自几年来的病变情况,并写道:“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在不安。”同时,他还特意另写一封信给毛泽东

身边工作人员,嘱咐她病情报告“或在主席休息后再读给主席听。一切托你酌办,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

几天过后,工作人员给周恩来打来电话:“病情报告都念过了,主席很惦记总理,有几天睡不好觉。”

周恩来病重期间,毛泽东的健康也每况愈下。进入1976年,毛泽东的身体恶化到吃药吃饭都需要人喂,讲话困难,行动更是不便。就在这时,周恩来逝世了。

1月8日上午,毛泽东正卧床听文件,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逝世的噩耗。他沉默许久,之后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下午,工作人员为毛泽东读中共中央政治局送来的周恩来逝世讣告清样。他一言不发地听着,眉头紧锁,双泪直流。

14日下午,工作人员向毛泽东念周恩来追悼会上的悼词稿,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痛哭起来。15日,工作人员问他是否去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这位悲伤的老人拍了拍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回答道:“我也走不动了。”

(摘自《纵横》)

Advertisement for Xiangsheng West River Mansion (祥生·西江樾). The ad features large stylized text: '人生當有別,洋房見高下' (Life should have differences, foreign houses see high and low). It also includes the slogan '纯正电梯花园洋房 四月限时特惠' (Purely elevator garden foreign houses, limited time special offer in April). Contact information: 0531 81176688, 接待中心: 新元大街与澄波湖路交汇处东南角. A QR code is present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